

【专题：学科发展讨论】

性别研究的中国语境：从议题到话语之争

吴小英

【摘要】性别研究作为社会研究中一个跨学科并兼具学术与行动导向的独特领域，一方面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和研究取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深扎根于中国转型社会丰富而多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实践，其发展路径经历了从本土妇女研究的崛起，到女性主义的引进、传播与“接轨”的努力，再到性别研究学科化、本土化过程中逐渐走向规范、成熟和多元的过程。文章首先对这一发展历程的不同阶段及其本土化特点进行考察，继而通过对近10年来国内主流性别研究遭遇的从议题到话语的批评与争议的梳理，分析性别研究的中国语境之变，从而强调所谓本土化知识建构的逻辑就在于走向开放、多元和包容的性别研究中国话语。

【关键词】性别研究；本土化；话语；语境

【作者简介】吴小英(1967-)，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性别研究、家庭研究(北京100732)。

【原文出处】《妇女研究论丛》(京)，2018.5.21~32

自引进西学以来，本土化就是一个伴生的问题，因为至今为止思想和学术的主体框架和脉络，依然是以西方为主导而承袭下来的。因此所谓本土化无非是对西方既有理论或传统在中国社会的在地适用性的拷问，同时包含着后学对于既有学术框架的反思和检讨。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学界和思想文化界刚刚开放，尚处在引介、模仿和以学习为主的阶段，那时整个人文社科领域还在致力于以规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为导向的学术和学科重建中。事实上这一导向至今未有改变，只不过到了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随着学科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日臻成熟以及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大，有关社会研究的本土化问题也时时浮出水面，成为学界备受关注并难以绕过的一个重要话题。

近些年来，随着寻找和讲述“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等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力推崇和推动，社会科学的本土化问题一改原来犹抱琵琶的低调，以建立“中国话语”“中国体系”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积极主动姿态站到了社会科学舞台的中央。在这种语境下，探讨何为社会研究的本土化以及在实践层面上何以本土化等问题，警惕为本土化而本土化的倾向，就显得尤为重要。性别研究作为社会研究中一个跨

学科并兼具学术与行动导向的独特领域，一方面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和研究取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深扎根于中国转型社会丰富而多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实践，其发展路径同样经历了从引进与“接轨”到研究的“中国化”或本土化的探索进程。本文首先对性别研究的这一发展历程及其本土化特点进行考察，然后通过对近10年来国内主流性别研究遭遇的从议题到话语的批评与争议的梳理，分析性别研究的中国语境之变，从而强调所谓本土化知识建构的逻辑就在于走向开放、多元和包容的性别研究中国话语。

一、性别研究的中国本土历程及其特点

有关社会科学是否需要本土化以及如何本土化的问题，在学界远未达成共识。以社会学为例，在不久前的讨论文章中，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尽管呼吁量身定制一套符合中国情境的本土化的社会学理论在情理之中，但从研究议题的本土化、理论和方法应用的本土化以及研究范式的本土化这三个层次来看，社会学的本土化都是个“伪问题”，因为任何好的社会学研究既要符合普适的规范，又要注重与社会情境的契合^①。也有学者将“社会学的中国化”理解为寻找西方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社会的“本土契合性”的

一个必经过程,并将这个过程分为“接轨”和“自觉”两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就是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阶段,大多研究是基于西方本位的立场;到了第二阶段,许多学者提出要基于本土研究立场,希望深入到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去寻找本土概念的根源和理论生长力,也就是费孝通晚年所提倡的“文化自觉”^[2]。

还有学者指出,中国研究领域至今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而是被两种对立所主宰:一是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现在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感情化,成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二是与此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的对立,等于把理论和经验截然分开,其中主张西化的学者以西方为经典,强调“接轨”,提倡本土化的学者,又局限于经验研究,无法提出自己的理论^[3];有学者将这两种问题分别概括为“食洋不化”和“食土不化”,认为二者均是由知识创新力不足所造成的^[4]。

以上不同学者对于“本土化”的理解显然存在差异,然而即便不一定赞同或者在不同意义上使用这一用语,他们却都强调了社会研究过程中引进西方主流理论或框架时注重与中国社会情境之间的契合性,进而在中国社会实践或者历史传统中生出自己的理论概念并与西方理论形成对话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沿用“本土化”这个概念,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在于如黄宗智所言,不要简单地把本土化视为与国际接轨的对立面,也就是摒弃那种价值符号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立场的本土化,从而探索一种方法论和知识话语意义上的本土化。纵观性别研究领域的中国发展历程,不难看到这两种不同含义的本土化时常纠缠在一起,从而导致学术共同体之间既相互竞争和促进又彼此分化与隔阂的局面。

(一)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

国内学界通常以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作为分水岭来划分性别研究的不同阶段。如杜芳琴在妇女学30年的回顾文章中,将这一领域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95世妇会之前妇女学的“起步阶段”,世妇会到2000年左右的“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阶段,以及2000年之后妇女学的“学科

化探索阶段”^{[5][6]};佟新关于30年社会学中的女性/性别研究发展阶段的划分也大致相类似,认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叶作为“妇女问题的呈现阶段”,达到了妇女研究的第一个高峰,其特点是“妇女的问题化”;而1994年前后至2000年左右引入了社会性别视角,是“妇女问题理论化阶段”;2000年之后社会性别理念被广泛应用,也被纳入了社会学的学科检讨中,可称为“将社会学问题性别化阶段”。她指出,正是’95世妇会在北京的召开,让妇女研究“从隐性变为显性,从描述性研究转向概念和理论建构”,并通过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和应用,推动了学科的本土化发展^[7]。

这些回顾和总结,更多是从学术思潮和学科建制的意义上梳理了妇女学或女性/性别研究的演变历程,其中被学者们津津乐道的北京世妇会的召开和社会性别理论的引进,成为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种转折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学科名称和研究取向上的一种新提法和新时尚,或者仅仅是研究队伍和地盘上的扩张。但从智识层面上看,却给妇女/性别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继而一方面从观念上完成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不仅改变人们看待女性和性别的方式,而且试图修正人们看待世界和知识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在研究范式上完成了与所处时代密不可分的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的转换。

作为这一领域早期开拓者的李小江在10年前的一次访谈中,明确将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做出了区分。她将20世纪80年代极富中国本土特色的妇女研究称为“妇女研究运动”,即在“男女平等”和“男女都一样”的背景下一种“寻找女人”、发出自己声音的尝试,是从民族和社会的宏大叙事中走出自我的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因而妇女研究在她那里根本就是文化领域的一场政治运动,其目标和立场都非常鲜明地带有一群体利益,即站在妇女的立场上、以妇女解放为目标;同时她也一再强调80年代妇女研究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其“纯粹的民间色彩”,即自下而上来自学界的以知识妇女为主体的自发力量^[8]。因此与西方女性研究相比,她认为中国妇女研究从一开始就有意或无意地抹去或淡化了

“女权”的政治色彩,并避开了“性别”之争,以“民间”和“科学”研究的姿态服务于其特有的政治性,与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非性化”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对比^[9]。因而这一阶段的妇女研究也呈现出方法论上的一种悖论:既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方式以及为妇女自发行动开辟的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又因其“科学”的名义而被视为“非政治化”的,从而获得当时社会的普遍呼应^[10]。然而这一吊诡之处,也为后来性别研究内部的张力和分歧埋下了伏笔。

90年代中叶之后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的进驻,妇女研究有了各种各样的新名称,比如女性学、女性研究、社会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等。与之前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终于找到了gender(社会性别)这个能够将女性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体验与宏大的社会结构问题勾连起来的全新概念和理论资源,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无论是否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大多在研究范式上认同社会性别的研究视角,同时性别分析方法也被视为有别于阶级分析方法并在妇女和性别相关问题上更具适用性和批判意义的一种崭新的方法论工具或知识生产方式^{[7][8]}。这等于为这一领域在国际接轨呼声很高的学术界走向合法化与专业化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也为众多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之间形成学术共同体提供了通道和桥梁。

尽管不同学者对于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理解可能千差万别,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并不单单是名称的变更,而是体现了研究立场从妇女本位向性别本位的转换,显示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希望走出单一的性别、向更普遍的知识议题进军和拓展的雄心。这一转换本身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流行的某种程度的“去政治化”倾向,也是中国本土的性别研究不同于西方的一大特色。王政在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词汇“女性意识”“性别意识”等进行辨析时指出,80年代对妇女问题的反思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笼罩一切的阶级概念的否定,宣告妇女从阶级范畴的分离;二是对“男女都一样”的主流性别话语的否定,男女有别成为新时期的时尚,而这一区别要靠“女人回归女人”来实现^[11]。事实上在引进西方女性主义之前,中

国妇女研究强调的是性别差异的自然性符合科学与人性的范畴,有学者称之为是以“差异政治取代平等政治”,即通过解构“铁姑娘”式的妇女解放运动来建构“有性人”^[12];而在引进gender这一西式概念和理论之后,“有性人”的说法因其“本质主义”之嫌而逐渐不被人提起,对性别的社会建构性的强调为国内这一领域的学者所广泛接受。与此同时,作为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产物的女性研究,传入中国学界后被基于国情进行了本土释意,成为学院派在性别研究领地构筑自己的地盘、进而赢得主流学界认可的重要工具。

(二)主流化中的本土化

中国性别研究本土历程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本土化进程始终是伴随着主流化而进行的。如前所述,所谓性别研究的主流化,除了在学科建制和社会影响力方面从边缘到中心的努力之外,最直接的含义就是将社会性别视角不仅应用于妇女与性别问题研究,而且作为一种方法论工具推向整个知识领域。因而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性别研究的主流化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相互交叠的两个进程:一是与西方女性研究国际同行的接轨,二是与国内主流学界的接轨^[13]。’95世妇会之后性别研究的两个阶段,恰好主要对应了这两个进程。其中从90年代中叶到2000年这个阶段,国内女性研究尽管一派繁荣景象,甚至吸引了大量学者转行进入这个热门领域,然而总体上仍局限于从事或者感兴趣于妇女和性别问题的学者圈内部,处在一种相对自我封闭的边缘状态,与主流学界和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对话甚少;而在21世纪之后的这个阶段,随着社会性别理论在学界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女性研究度过了引进西方女性主义的蜜月增长期之后,一度陷入了发展的瓶颈和迷茫期。随着越来越多受过学科专业训练并熟悉国际学术思潮的年轻一代学者的加入,终结性别研究的自我隔离状态、重返学科主流的呼声以及主张学科化、专业化渗透的策略逐渐成为共识,这一趋势也迎合了国内学界各门学科日益明晰化的与国际接轨的需求,即打破学术的“隔离区”、让性别研究在不同学科间“旅行”而互惠^[14]。

与这两个主流化进程相伴的本土化问题,首先

表现在如何评判主要基于白人中产阶级经验和立场的西方女性研究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是否适用的问题。有学者从一开始就警惕地与女性主义保持距离,视其为来自西方的一种“霸权话语”,尽管可以为反思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提供利器,但是不仅无法给出有用的答案,而且使得本土的诠释始终处在“他者”或者“失语”状态^[8];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这些概念和理论需要经过本土的语境化和再阐释,将全球的视野、区域的比较和本土的行动相结合,才能形成真正扎根于本土的研究^[19];还有学者认为,女性主义核心概念 gender 的翻译、解释以及在中国被接纳或拒绝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在双向选择中不乏误读的“理论旅行”过程,是与本土的政治、文化对话与妥协的产物,只有在特定的历史和语境中才能理解其意义^[16]。因此,也可以说每一种不同的翻译或命名背后,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本土的探索与选择,同时也代表了不同的理念与方法论策略,并由此影响了中国性别研究的后续传统及其行动尝试^{[5][13]}。

本土化的另一个维度是理顺性别研究与主流社会研究之间的关系,让自己成为被社会科学这个大家族所接纳和认可的一员,同时又保持自身鲜明的独特性。但这样一种来自性别研究与主流社会研究之间的融合,本身在方法论上就面临着难以弥合的悖论:一方面,它需要遵循主流学界通行的方法论准则,即以价值中立的纯学术追求为目标,而这正是性别研究意欲批判和改造的地方;另一方面,性别研究从引进西方女性主义的那天起就从不回避自己的价值伦理取向,公开宣称要揭示不平等的机制、为女性和弱势群体说话,并将研究推进到更多参与式或行动性的计划当中,这意味着性别研究想要完全撇开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如同有学者观察到的,受国际学术思潮以及中国本土社会变迁语境的影响,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出现了底层研究的热潮,社会科学的主要关注点越来越聚焦于转型结构中处于弱势和边缘的底层群体。性别研究由于其研究对象多为社会弱势群体,其对与妇女相关的现实社会问题一直保持密切的关注,作为这种底层研究中的一员,在学界找到了更多的同盟军,与主流学术之间的

方法论张力也呈现出微妙的变化趋势:不再陷于孤家寡人的独家困境,而是逐渐被纳入了整个社会科学界日益分化的多元话语体系中。与之密切相关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即性别研究内部学院派与行动派之间分分合合的动态关系。

(三)学院派与行动派的若即若离

与西方女性研究相比,中国性别研究还有一个极为不同的特点,就是研究者很少像他们的国际同行那样公开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这当然跟国内外学者所处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环境的差异有关。西方女性研究学者往往同时也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或行动参与者,认为社会运动本身给研究提供了活力和源泉,甚至在方法论上强调女性研究与妇女运动共享着同一个解放的目标:都是为女性说话(for women)而不仅仅是关于女性(of or about women)或者由女性来做(by women)^{[17][P6][18]},因而女性主义的学院派与行动派之间素来是重叠的,并没有明显的区分界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性别研究学者虽然大多认同女性主义的理念和学说,但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工具,来分析中国转型社会面临的妇女、性别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并达到与国内外主流学界接轨的目的。因此尽管女性主义大规模传入时,客观上借助了‘95世妇会的政治东风,“社会性别主流化”当时被视为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个重要议题和策略,因而真正把西方女性研究的范式推向学界,是“妇联和学界顺势应时共同运作的结果”^[6],然而这个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国内性别研究真正向学院派转型的开端。考察当时学界对引进概念的翻译和命名,不难看出普遍达成共识的都是更加中性化的、政治上相对平和的用语,如在那一代学者圈里更推崇使用“女性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除了认为前者能更充分地传达出女性主义的丰富内涵外,也考虑到了中国本土政治环境对于“权力”一词的敏感,以及女性主义相比女权主义一词在广大的普罗大众以及主流文化中更具亲和力而又不乏革命性的特点^[13]。

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被包装成“非政治化”的性别研究在学科化、学术化的过程中尽管从未抵达主流学界的核心地带,然而不可否认已逐步成为具有

合法性和一席之地的显学,比如拥有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网络、期刊、学会、研究生培养基地等,并逐渐被各主流学科所接纳,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这一过程中,除了做性别与发展等相关国际项目的学者受制于基金会的要求强调研究的伦理和行动导向之外,性别研究也被指越来越远离中国妇女运动实践,面对市场化以来女性被边缘化和弱势化的现实和文化,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己的回应、反省和言说能力,也没有创造出可以与之抗衡的资源 and 力量,反倒日益沦为一种在学院/知识内部循环的东西,成为“去历史、去政治、去革命地人为叠加到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中的话语游戏”^[19]而饱受诟病。这一批评是否公允虽然值得讨论,但是学院派与行动派之间的分分合合、若即若离,的确构成了中国性别研究的一种独特姿态。

如果说性别研究第一阶段的前辈学者当初是怀着性别平等与妇女解放的情怀、把研究作为探索理想的行动的一部分来进行,因而那一代学者是集学院与行动、官方(指妇联)与民间于一体来开展研究的话,那么第二阶段之后因 gender 理论的引入而形成共识的学者共同体,随着学界专业化分工与规范化考核体系的成熟以及学者间的代际更替,已日益分化为学院取向和行动取向的不同类别和人群。尤其在2010年之后,随着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80”/“90”后青年行动者的崛起以及国内整体社运环境的变革,性别研究领域学院派与行动派的分离日渐成为一种趋势,即使他们之间依然常有万水千山的联系,时而惺惺相惜,时而互为齟齬。不仅如此,在学院派内部,不同知识背景与性别理念却共同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之间也形成了诸多分化和歧见,使得主流性别研究面临从议题到话语的多方批评与争议。

二、中国性别研究的反思:

从议题到话语的批评与争议

国内性别研究如果进一步细分,可以将2010年之后划分为第四阶段,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无论是学院派还是行动派都各自走上了更加专业化的道路,并在彼此分离和呼应中完成了性别研究的代际更替,包括以“70”/“80”后为主体的年轻一代学者在学界的异军突起和多元分化,以及以“80”/“90”后为主

体的行动者通过熟练运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方式所带动的性别热点话题的讨论与女权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期间转型社会日益显著的阶层与贫富分化以及思想文化领域日益复杂多元的思潮和立场,都给性别研究共同体之间的分歧提供了土壤。其中学院派内部的分歧与分化不仅源自学科范式、知识结构或理念的差异,还源自不同世代或群体面对当下全球化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多元文化和价值观所持的不同理解和应对态度。

(一)对 gender 概念的二元论误读及其后果的反省

许多学者在反思与检讨女性主义本土化历程时指出,作为性别研究核心概念的 gender 一词的引入、译介和传播,以及它在中国本土研究实践中的广泛运用和知识再生产过程,一方面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或理论的空白,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而留下了自身的局限,集中表现在性别二元论及其所导致的研究议题和立场的窄化和偏颇。

闵冬潮在考察 gender 概念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时指出,这一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到达中国后出现了一些误读,例如性别成了“与性脱钩的 gender”。出于对本质主义的警惕,引进者强调的是 gender 的社会层面及 gender 与 sex 的分离,而忽略了在其发源地多年以来对这二者关系的讨论以及对其分离与对立的批评与反思,其结果将中国妇女研究中并没有充分讨论的性与性别的关系、性与妇女的个体、主体意识等关系又封存了起来。由于甩掉了性、身体等性别的“自然”方面,导致诸多相关研究领域流失^[16]。李小江从女性主义引入伊始就一直反对将 gender 翻译为“社会性别”,其理由除了认为汉语的“性别”一词中已经包含“社会”的意涵之外,最主要的是主张性别是一种“以自然为基础的社会概念”,不能将其自然/生理性排除在外。她认为女性主义剥离了自然性的 sex 而强调社会性的 gender,只是一种符合西方社会情境的策略性做法,并不适合一向以压抑身体和性作为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8]。

一些从事身体和性研究的学者将国内主流的社会性别研究斥为“无性之性别”,不仅在议题上呈现出很强的“忌性”特点,而且西方女性主义中有关性

的争论、性对于性别的重要性的讨论尤其是主张女性性权利和性自主的那派声音基本上也被过滤掉了。其中性相关议题的存在状态可归纳为“‘在场’而‘缺席’”，即主流的性别研究学者在性的议题上大多表现出沉默或“集体失语”，或大多秉持简单化的观点，坚持女性在性领域被物化的“被动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受害者”话语，因而在其 gender 研究的目录下无法看见丰富多变的 sexuality 文化，加上中国社会对性的高度道德化绑架，这些都阻碍了更为复杂和积极的对于性和社会性别之间互构关系的探讨^[20]。可以看出，这种由 sex/gender 的二元论所导致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研究议题或领域的窄化或偏见，更在于研究话语和理念上的分歧。例如在越来越频繁出现的一些跟性或性别治理相关的公共热点问题上，主流性别研究学者与性研究学者之间就表现出观点和立场上的差异甚至冲突。尽管有学者把这些差异归于“观念分歧和范式之争”，如双方对于性骚扰的定义、类型和边界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侧重，实质上反映了各自所依循的“平等范式与自主范式之争”^[21]，但是更核心的分歧其实还在于对性骚扰这一现象的总体性判断以及背后所形成的不同话语。主流性别研究学者认为性骚扰是一种建立在两性权力不对等基础上的性暴力和性别歧视，因而主张建立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公共介入与干预机制；而性研究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受害者情结”和希望国家力量介入性管制的“麦金农式话语体系”。他们自称反性骚扰中的“反建制派”，担心像联署或者“#Me Too”这样的运动可能会导致本来就模糊不清的性骚扰概念和边界的“无限扩张和泛化”，从而在不容置疑的反性骚扰“政治正确”话语下使性的多元表达空间受到压制^{[22][23][PP211-213][24]}。

除此之外，对性别二元论的批评还包含对国内主流性别研究中依然存在的所谓“男女二元性别思维”惯性的质疑。有学者指出，主流性别研究虽然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男强女弱的性别刻板印象，通过对性别的社会建构性的揭示，批判了带有本质主义取向的二元论和男权思想，但是这种挑战还存在很大局限性，例如整体上并未跳出男人和女人的二元分析框架，研究对象依然主要以男女两分的生理性别

为边界，因而某种程度上反而强化了“非男即女”的二元思维，原因在于缺乏对性别认同多元化的认识，以及对 90 年代以来西方与 LGBTQ 相关的酷儿运动和性政治的忽略或排斥^[20]。另外，尽管同性恋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中逐渐进入中国公共话题，“同志”社群在网络和城市空间的表现相当活跃，甚至同性婚姻的讨论也如火如荼，相关研究越来越专业，但总体上仍处在性别研究的边缘地带，主流的亲密关系研究预设的往往是一种所谓“异性恋正统主义”的模式，其前提就是以异性恋作为唯一的规范和标准。这不仅限制了公众对同性恋等性少数人群的性自由和性权利的认知，而且限制了对特定社会现象和问题的认识和理解，限制了解决问题的视野和思路的拓展^{[25][PP229-231]}。

此外有学者指出，即使在异性恋的框架下，主流性别研究还存在明显的“男性盲视”现象。例如有关农民工的性别研究多集中在对打工妹的研究和关注，而作为男性农民工所承受的来自性别结构的压迫与束缚以及在认同和塑造自我性别身份过程所经历的苦痛与挣扎，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和重视。这种盲视很大程度上与人们普遍认为男性在性别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有关，而这种考察性别关系时秉持的男女对立的分析框架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局限^{[26][PP11-12]}。同时，作为西方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的男性研究，在国内也鲜有相应的介绍，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在男女二元的性别思维模式下，性别研究成为缺失了男性并排斥男女之外任何非异性恋的研究，某种程度上退化为一种仅仅关注生理女性的妇女研究^[20]，这在某种程度上已与引进女性主义的初衷相违背。

(二)有关学术合法性及其社会源泉问题的两面批评

女性研究出道至今，从来不乏对其学术合法性与权威性的拷问，而关于其学术性的评判，始终绕不过研究与运动实践之间关系的探讨。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国内性别研究界就其学术合法性及其社会源泉问题一直遭遇来自两边的批评：一方面，来自主流性别研究圈外的学者批评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片面强调价值取向或伦理诉求，以致将性别研究简化为

关于女性、由女性而做以及为女性而做的研究,只聚焦于女性自身,而将男性简单地理解为享受着剥削女性所带来的“父权制红利”的群体,这样一种研究取向,难免导致性别研究“自陷囹圄的窘困”^[26](PP138-141)];也有学者将之归纳为一种“以父权制和性别政治为核心的分析策略”,但在应用于中国本土时忽略了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情境,以简单化的男女不平等、男性压迫女性作为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唯一视角,导致结论先行及性别政治的简化应用,也忽视了女性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 gender 概念本身的说服力和批判力减弱^[20]。

以上这些都是从本土化实践的角度批评国内性别研究对于女性主义知识再生产中“政治正确”的偏颇理解或不当运用,认为其结果恰恰有悖于社会性别理论本身所倡导的东西。也有学者从方法论角度对女性主义研究本身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诉求阻碍了在学术领域的发展,社会性别是一种关系,而不只是关于女性的;女性不是单纯的受害者,男性也不是单一的压迫者;性别研究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独立领域,致力于为知识积累做贡献,而不是站在社会科学的对立面上,以实现政治诉求为己任,亦即主张性别分析方法在立场上的去政治化,试图突破女性主义在方法上的自我束缚,遵从客观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明确“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学术领域内的发展与进步,而非实现更多的政治理想”^[18]。

另一方面,来自主流性别研究圈内的一些学者则批评当初以“社会变革与变革社会”的政治性参与作为建构自身合法性起点的妇女研究,正日益面临“自身政治性流失的危机”,其根源与女性主义实践在中国的“文化转向”或称“文化政治”有关^{[19][27]}。有学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中国女性主义实践与70年代的美国有相似的一面,都侧重并转向文化层面、学术研究和话语领域,强调性别差异和性别体系的独立性,并逐渐同经济、政治和社会运动实践产生疏离。这场由学院派知识精英主导的文化转向,追求与西方现代性接轨的启蒙话语和个人的主体性,从一开始就建构了一个“排他的框架”,遮蔽

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作为一个制度实践的不可替代性以及它为女性主义研究运动兴起所奠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从而削减了“妇女研究运动”初始的多元异质性和复杂性^[27]。

有学者指出,妇女研究这种“政治能量的流失”,源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之间主流意识形态中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断裂与转型,以及由此形成的由“阶级政治”向“身份政治”转化的社会思潮嬗变。期间,学院派女性主义通过反思、批评甚至告别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生产出了指向“后革命”时代的“性别政治”,作为“阶级政治”的替代物参与了新时期最为重要的自然化“个人”概念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男女平等”的口号未变,但是内涵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前三十年更加强调妇女问题的社会化涵义以及它的制度解决路径,而后三十年妇女问题更多被当作妇女自身的问题,实现平等的预期更多落在妇女个体素质和生存能力的提升上。这种研究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异化为一种温和然而也是无力的文化政治,丧失了现实的回应性与自身的活力。只有通过本土历史传统重新建立关联,实现性别话语的再“政治化”,才能找出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得以产生的政治经济根源,从而真正焕发出具有抵抗性的变革现实的力量^{[28][19]}。

可以发现,关于性别研究的学术合法性及其社会源泉问题的两面批评,其主要分歧在于对方法论和研究目标的不同理解上。但他们也有个共同的前提,就是都认为性别研究的方法论实践中包含着“性别政治”,区别只在于一方指责因“性别政治”而导致议题和论点的窄化和限制,使学术性打了折扣;另一方则指责因“性别政治”而导致对“阶级政治”的摒弃以及原子化个人的建构,遮蔽了更丰富的政治可能性,使得性别研究成为无源之本而削弱了当初的学术合法性。双方对于“政治”的理解显然存在很大差异,前者信奉女性主义“个人的是政治的”的激进口号,将两性之间权力关系及其背后文化机制的研究纳入性别政治;后者则相信性别的“政治化”必须诉诸对形成不平等性别秩序的政治经济根源的批判,认为主流性别研究虽然揭示了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歧

视和不公,但更多把抗争目标限制在个人自由和权利上,并未指向对全球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制的批判^[12];这些注重对日常生活、个体经验和记忆所做的研究,强调底层的、草根的或边缘化的视角,被认为过于“碎片化”,尽管挑战了主流霸权话语,但容易“一味强调个体能动性而忽略宏观结构性问题”,使得研究本身的解释力受限,并导向“非政治化”倾向,背离了女性主义应有的立场^{[29][30]}。

(三)关于性别研究底层化还是精英化倾向的争议

性别研究尽管在方法论意义上存在着学术合法性是否诉诸政治或者介入程度多少的争议,但有一点越来越达成共识: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很难在研究过程中得到完全赦免,因而研究选题、假设、方法、理论的偏好或结论的分析等都有可能体现出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取向,而这也构成了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纷争的来源。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国内思想文化界呈现出日益复杂多元的倾向和立场,使得整个学界深陷其中,也深深地影响了性别研究领域的选择和走向。有关底层化还是精英化的批评和争议,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女性主义研究强调女性经验是知识生产的重要来源,因而主张站在包含女性在内的底层弱势群体的立场来对整个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进行重新评判和分析,甚至提出这种底层立场对于不平等的揭示和知识的建构具有更大的优势,即知识论意义上的所谓“立场论”之说^[31]。这种研究取向跟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兴起的以史学家为代表并一直延伸到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批判的底层研究思潮不谋而合,他们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命运,试图理解这些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或阶层的处境,开启了“书写底层”的新方法和新潮流,包括对底层的政治逻辑和“非政治化”日常抗争模式的探讨,以及关于在精英讲述中被销声匿迹的底层如何可以发声即“底层如何被表述”的追问^{[32](PP2-13)},等等。有学者指出,这种底层研究思潮迎合了中国研究者对于市场化以来出现的不平等问题的学术关切,包括农民工、妇女等在内的弱势群体研究成为主导性

趋势。这些研究展示了非官方视角的底层生活境况,为改善底层群体的社会福利提供了积极的政策支持^[33]。

与之相反,性别研究圈内的很多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看到的则是以城市知识女性为主的学院派妇女/性别研究正日益呈现出精英化和职业化的倾向,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与全球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之间形成某种暧昧的联盟或同谋关系^{[12][34]}。有学者指出,90年代gender理论的引进,性别研究从此纳入身份政治的轨道,具有以差异取代平等、以承认替代阶级、以个人主义取代集体主义、以文化批判取代政治批判等特征,无意中契合了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新资本主义精神”,却无力回击其对妇女构成的结构性压迫和伤害,只能在接受现有框架的前提下争取妇女的个人权益,并盲视自由市场体制对不同阶层女性实现真正个人自由的限制^[12]。

一些身居海外的学者在对西方女性主义进行反思时也指出,女性主义实践往往强调与主流体制的独立和分离,其结果与阶级和其他社会经济问题抽离开来,失去了改变社会结构的政治能动性,并迅速演变为“日常个人化的甚至商业化的中产阶级女性自我时尚的一个标签”^[29]。同样,那些号称女性既可以穿高跟鞋也可以穿跑鞋、可以结婚也可以单身,即强调女性选择的自由、“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样子”的话语虽然让人觉得很女权,为国内年轻女性所追捧,但也被学者批评为本质上不过是一种“个人消费主义女权”,是在“后革命”时代回归性别差异、剔除阶级话语的结果,因而它只能是精英/上层中产的,而不是女性整体的^[34]。

可以看出,关于性别研究底层化还是精英化倾向的争议,其核心可归结于性别的阶级性问题,它提示女性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难以忽视的,这意味着并非所有打着女权或者底层弱势群体旗号的话语就一定通向正义,同时也提示国内性别研究不同阶段的语境之变。因而许多学者主张通过阶级的回归,将性别重新带回到结构分析的层面,为此需要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传统进行重新

评估和检讨^{[12][29][30][35]}。

三、结论和讨论:走向开放包容的 性别研究中国话语

回到文章开头有关本土化的讨论,笔者认为,重要的在于不要简单地把本土化与西方化或国际化对立起来,尤其是把这种对立意识形态化,而非置于知识论或者方法论的层面上来讨论,那只会给学术本身的独立性带来伤害。有学者曾对社会学本土化的辩护者和反对者两大阵营的论点进行了细细梳理,发现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角度和层面:一是认识论/方法论的分析框架,讨论的是“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即西方社会理论和知识运用于中国本土是否以及何以有效;二是学术民族主义的分析框架,讨论的是西方知识的引进和支配地位是否会导致中国本土的学术自主性甚至民族话语权的丧失,后者常常卷入“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文化立场和意识形态之争。然而作者认为问题的症结并不在这里,因为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是要提供有效度的理论知识,从而更贴切地来解释中国情境^[4]。

性别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中,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常常与学术自主性和话语权问题纠缠在一起,因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领域发展路径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也导致了学者共同体的多元分化与隔阂。因而如果一定要概括一个性别研究中国话语的未来走向的话,其要义只能是:走向开放多元、兼容并包的性别研究,让研究既能增进知识的更新、与国际对话的能力,又能适应和切中中国社会语境之变。为此需要打破一些既有的偏见或禁忌,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迎来性别研究更加丰富的可能性。

(一)摒弃理论传统上的排他性,走出单一刻板的性别研究范式

理论工具既是学科的资源,也可能构成研究的制约。性别研究40年来的本土发展历程、特点及其后来的分歧和争议表明,以一种理论传统为正统而排斥其他,虽然有利于主流研究范式的传播和共同体的建立,但也会很大程度上限制研究的视野和领域的拓展,最终可能损害研究本身的创造力,并导致共同体之间形成边界封闭的“小圈子”现象,彼此隔

阂而不利于学科整体的发展与进步。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以强调“男女有别”的性别差异性而隆重出场的妇女研究以及对于gender理论的选择性理解和应用,是基于反对父权制和性别压迫的一种身份政治的研究范式,其实也是对既有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重视阶级分析框架的一种反思。而本世纪以来尤其过去的十年当中,主流性别研究所遭遇到的批评和非议,则是基于gender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中单一的性别建构论分析框架及其所依据的性别政治,面对日益多元化的性/性别观念以及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巨大转型所带来的结构性压制和不平等,其解释力已经捉襟见肘。因而众多性别研究学者呼吁重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将阶级分析重新带回到性别研究中,也反映了全球以及中国性别与社会生态的变化。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理论话语的转向并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轮流更替,亦非从所谓“后革命时期”性别与阶级的分离、到全球化时期阶级与性别的再度联姻这么简单,而是意味着由于阶级、性别、城乡、地域、文化等多重结构的交叉存在,使得研究过程切入视角的交叉性以及经验的交叉性无法免除^[34],因而对不同的理论传统保持开放,而不是固守于一种理论假说或研究范式,显得至关重要。中国主流性别研究之所以常常招致两面夹击,就在于本土化历程中阶级话语和性别话语在不同阶段的“政治正确”中分别发挥了核心作用,致使别的理论处于黯然失语状态。尤其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在国内思想领域复杂多元的争论框架下,性别研究也被迫常常加入“站队”行列,或者将曾经构成女性主义和“性别主流化”战略根基的启蒙理论传统扔出了自己的理论工具箱,或者常常忽略或遗忘了工具箱中还有一款曾经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基础的阶级理论传统。由此,在文化批判的意义上比启蒙思想多一点、阶级批判的意义上比马克思主义少一点的女性主义,同时遭遇到了来自两边的批评和质疑。而打开理论传统和研究话语的边界,无疑将使它收获更多的盟友,也在面对当今复杂的性别与社会问题以及知识的建构过程中更加游

刃有余。

(二)保持对不同阶层和时空的女性实践及其多样化经验的敏感性,让性别研究走出性别、紧贴流变的中国社会语境

本土化说到底知识的情境化及其实现方式。gender理论以它对父权制性别体制对女性的规训和压迫的揭示见长,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被斥为只反映了西方白人中产阶级的女性经验,导致强调女性多样性及多重压迫结构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理论的诞生和流行,受压迫者的经验被视为是种族、阶级、民族等多重压迫机制互动的结果^[30]。然而这种理论和分析框架在国内性别研究界很长时间内被忽视,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系统的介绍,这当然也是同样以海内外知识精英女性为主导的中国性别研究界依据当时中国社会语境做出的选择结果。

直到21世纪以来,市场化和转型社会带来的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和社会矛盾愈加显著,使得不平等仅仅依靠性别分析已经很难得到充分阐释,交叉性理论才成为国内学者跃跃欲试的一个新思路。有学者对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的产生和发展脉络以及相关争论都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指出作为一种分析策略对重新审视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女性内部的社会分化及其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能性,也可以借助这种视角和方法挖掘本土的理论传统和实践资源,重塑中国性别理论和实践的互动,特别是寻回长期被忽视的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声音^[36]。当然这种诞生于美国的概念和理论运用于中国语境下也可能面临自己的局限性,因此也有学者意欲引进“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的概念,试图将性别视角整合进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从而把性别问题重新带回到结构分析中^[30]。

让性别研究走出性别,走入复杂的多重社会结构以及不断流变中的社会语境并非易事。尽管性别圈内外有底层化与精英化之争,但是自80年代以来主流性别研究的历程来看,从性别与阶级的分离、女性主义思想在国内的流行脉络以及受众群体、长期以来女性对个人自主性的关切更重于对平等的关切等等,都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精英路线。如同有学者

所指出的,由于阶级话语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治性,使得其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尴尬的存在”^[34]。而打破这种尴尬的是不同社会语境下学界研究倾向的悄然挪移,包括农民工研究、劳工研究和底层研究的主流化,社会学的分层研究中不平等议题受到广泛关注,以及底层弱势群体的话题在主流社会和公众意识中受到高度关切等等。

也只有在这种新的语境下,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的传统,才能成为一种新的学术转向。而大多数海内外中国性别研究者希冀通过这种方式寻找到能够抵抗全球化风险和市场化挫折的新一轮话语资源,甚至有学者希望借此提供反抗全球资本主义并为世界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贡献中国另类经验的途径^[29],却鲜有学者强调这种批判性梳理或吸收的要义,仍在于不能离开不同时空下妇女解放实践的具体社会情境,即批判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到过去。同样,是否保持了对不同阶层女性多样化经验的敏感性和开放性,有时也并非很容易辨识。例如国内一些性别研究学者将市场化以来所有的妇女问题和性别不公都归结于市场体制的戕害,包括通过“产权的私有化和家庭的私人化”造成对妇女经济分配上的不公和文化上的物化和贬低,而主流的社会性别理论被认为既无法给出强有力的女权批判,也看不到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通过结构性变革所达到的妇女自身主体能动性的建构^{[12][35]}。然而这些学者似乎从未考虑过,全球化和市场转型尽管导致不同性别、阶层之间不平等风险的加大,但在中国的语境下给妇女带来的是否只有单纯负面的影响?不同阶层的女性是否也从这个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益,例如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带来更多开放选择的机会,以及导致一些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和赋权的可能?学者们所批判的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不公和资本带来的结构性压迫和剥削自然不容置疑,但对不同阶层和处境的女性来说是否会有不同的体验?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之前,如果不充分考虑中国整体的社会语境和不同时空下女性的多样化实践和经验,到头来会不会错把也许只是知识精英们想象的底层视角,当成了真正来自底

层女性自己的声音?

(三)尊重性别研究的多学科视野以及学者的多元性,让性别研究话语成为共同体之间交流对话而非分界立墙的工具

性别研究学者共同体之间的话语差异或冲突,一定程度上跟这一领域越来越走向多学科的专业化有关。知识结构的差异源于不同专业领域的知识语境有所不同,同样,不同时代的学者由于所处时代的社会语境和性别文化的差异,也会形成价值观上难以弥合的代际鸿沟。跨越这些知识和代际鸿沟的途径只有通过相互交流、开放论辩,达成相互理解或者彼此尊重。对话甚至争吵,远胜于共同体之间彼此相互隔阂。令人担忧的是,国内性别研究界近些年来却出现了这样的苗头。

从纵向的角度看,活跃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性别研究前辈学者与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活跃于学界和网络的年轻后辈学者,尽管都是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思想不同程度的拥趸者,但由于所受教育和知识积累的差异,以及生命历程中体验到的性别传统与社会境遇的差异,使得他们进入性别研究的起点和诉求就有所不同;又由于对西方社会或海外学界的了解程度的差异,以及与国家或体制之间关系的不同,他们对于性别研究所关注的议题和领域也会有不同偏好,这些反过来也造就了他们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差别及其立场变动。同样,学院派与行动派之间由于角色定位和目标的差异,也越来越走向分化。双方对于彼此曾经或者现在的处境、方式和理念缺乏足够的了解和体悟,也是造成他们之间一些隔阂与对话障碍的原因。

从横向的角度看,不同专业领域或者研究取向的学者之间,由于不同的研究传统、理念和范式,以及对于性别研究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彼此差异甚至冲突的研究话语。这种分化或冲突在社会热点事件爆发时由于网络新媒体的推波助澜而进一步夸大。例如主流性别研究学者与性研究学者之间在有关身体和性/性别治理的问题上的观点一向泾渭分明,他们看起来似乎在对于事实的

判断、治理的策略等方面都存在分歧,可以归结为对于性/身体选择的结构性制约与个人自决性之间的平衡点的理解分野,最终则可以从根本上归于对社会治理中国和市场关系孰重孰轻的评判和所秉持的立场差异。

同样,关于主流性别研究的学术合法性及其政治资源的争议中,显示出不同学者对于“政治”的理解也存在相当大的出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取向的学者主张重返阶级,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与性别视角相结合,主张将公共领域的话题带回到私人生活的分析中,否则就丧失了学术的政治原动力。这种批评的漏洞在于,为何性别分析与阶级分析相比就一定不具有政治性?例如金一虹关于“流动的父权”的研究,结合中国本土农村社会的田野实践、在女性主义私人 and 公共父权制的二元论基础上提出的“集体父权制”概念,包含了家族集体父权和村落集体父权,就是一个相当具有突破性和分析力度的本土理论视角^{[37](PP363-422)},谁也无法否认其批判性的政治力量。还有,在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倡导者中,为何性别政治所强调的个人自主性就被视为是精英化的、无力的文化政治,而不能成为构成底层边缘女性自我能动性的重要方面?黄盈盈关于“小姐”等边缘群体的研究以及有关女性日常身体、情欲故事的方法论探讨,试图搭建起更好的社会学故事讲述和生产方式,使其“具有跨越身体边界与社会规范之勇气,具有审视与挑战性等级的力量”,并在实践层面上促进更为宽容、多元、积极的性/别与身体的社会空间^{[23](PP249-252)},其革命性同样毋庸置疑。

性别研究共同体之间的分歧和争议还远不止列举的这些,然而反过来也说明了这个领域还有巨大的研究空间和主题有待挖掘和对话。一个开放包容的性别话语,才能引领这个领域继续前行。

参考文献:

- [1]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J].社会学研究,2018,(2).
- [2]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

路径[J]. 社会学研究, 2018, (1).

[3] 黄宗智.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1).

[4] 王宁. 社会学本土化议题: 争辩、症结与出路[J]. 社会学研究, 2017, (5).

[5] 杜芳琴、王珺. 中国大陆妇女学: 知识的建构与传承——30年回眸、反思、展望[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0, (6).

[6] 杜芳琴. 从研究到学科化并通向行动主义: 中国妇女学30年反观与理论化[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3, (2).

[7] 佟新. 30年中国女性/性别社会学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08, (3).

[8] 刘宁、刘晓丽. 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李小江教授访谈录[J]. 晋阳学刊, 2007, (6).

[9] 李小江. 妇女研究的缘起、发展及现状——兼谈妇女学学科建设问题[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4).

[10] Wang Zheng. Research on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A]. in *Guide to Women's Studies in China*[C]. ed. Gail Hershat, Emily Honig, Susan Mann, and Lisa Rofel, Berkeley U. S. 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8.

[11] 王政. “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析[J]. 妇女研究论丛, 1997, (1).

[12] 宋少鹏.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J]. 开放时代, 2012, (12).

[13] 吴小英. 女性社会学方法论[A]. 张李玺主编. 中国女性社会学: 本土知识建构[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4] 闵冬潮. 妇女研究: 在不同学科间“旅行”[N]. 社会科学报, 2005-08-04; (5).

[15] 杜芳琴. 全球视野中的本土妇女学——中国的经验: 一个未完成的过程[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5).

[16] 闵冬潮. Gender(社会性别)在中国的旅行片段[J]. 妇女研究论丛, 2003, (5).

[17] Oakley, Ann. *Experiments in Knowing: Gender and Method in the Social Sciences*[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18] 蔡玉萍、杜平. 性别分析还是女性主义研究: 方法论的一点反思[A]. 谭少薇等主编. 性别觉醒——两岸三地社会性别研究[C]. 香港: 商务印书馆, 2012.

[19] 董丽敏. “性别”的生产及其政治性危机——对新时期中国妇女研究的一种反思[J]. 开放时代, 2013, (2).

[20] 黄盈盈. 反思 Gender 在中国的知识再生产[J]. 社会学评论, 2013, (5).

[21] 宋少鹏. 何为性骚扰?: 观念分歧与范式之争——2014年教师节前后“性学派”对“女权派”的质疑[J]. 妇女研究论丛, 2014, (6).

[22] 李思磐. 女权者痛扁性权派: 性骚扰不是性权利[EB/OL]. 微信公众号“腾讯·大家”, 2018-01-19.

[23] 黄盈盈. 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24] 刘立春. 傲慢的“女权派痛扁”说的几个偏见[EB/OL]. 微信公众号“性研究ing”, 2018-01-23.

[25] 魏伟. 酷读中国社会: 城市空间, 流行文化和社会政策[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26] 杜平. 男工?女工: 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性别、家庭与迁移[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7.

[27] 王玲珍. 重新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实践和性/别差异话语——以李小江为例[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6).

[28] 董丽敏. “政治化”性别: 走向“公民社会”?——以“后社会主义”中国为场域的考察[J]. 开放时代, 2016, (1).

[29] 王玲珍. 关于中国革命与性别平等/解放的理论再思考[J]. 妇女研究论丛, 2017, (5).

[30] 董一格. 新视角、新材料: 前沿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视角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研究[J]. 妇女研究论丛, 2017, (5).

[31] 吴小英. 女性主义知识社会学素描[A]. 苏国勋主编. 社会理论(第2辑)[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2] 郭于华. 受苦人的讲述: 冀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3.

[33] 李小云. 消费“底层”——当代中国的民粹性学术[EB/OL]. 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 2017-10-24.

[34] 单佳慧. 既有高跟鞋又有跑步鞋: 警惕个人消费主义女权的陷阱[EB/OL]. 微信公众号“土逗公社”, 2016-03-21.

[35] 钟雪萍. 为什么反思“革命与妇女解放”成了女性的专业[J]. 妇女研究论丛, 2017, (5).

[36] 苏熠慧. “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J]. 社会学研究, 2016, (4).

[37] 金一虹. 中国新农村性别结构变迁研究: 流动的父权[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